

五四運動與上海社會

熊月之*

五四運動的爆發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溯源，這一運動的興起，無論是思想醞釀，人才準備，還是抗議方式的形成，都與上海有重要的關係。

晚清人在比較京滬兩城時，常用文明、野蠻、革新、守舊等對比性很強的字眼：

時人謂上海、北京為新舊兩大鴻臚，入其中者莫不被其融化，斯誠精確之語。北京勿論矣，請言上海。自甲午後，有志之士咸集於上海一隅，披肝瀝膽，慷慨激昂，一有舉動，輒影響於全國，而政府亦為之震驚。故一切新事業亦莫不起點於上海，推行於內地。斯時之上海，為全國之所企望，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¹

民初人謂：

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恒處對峙地位。……抑專制之世代，有政治而不認有社會，盡

*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¹ 田光，〈上海之今昔感〉，《民立報》，1911年2月12日。

視社會為政治卵翼品，不使政治中心點之外，復發現第二有勢力之地點，防其不利於政治也。惟上海之所以得成為社會中心點，其始也，因天然之地理，為外人涎羨。其繼也，又因外人經營之有效，中經吾國太平戰事，而工商及流寓，乃相率而集此。而其最大原因，足以確立社會中心點之基礎，與政治中心之北京有并峙之資格者，則實以租界為國內政令不及之故。²

時人的評論未必完全妥貼，但都看到了清末民初京滬兩大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巨大差異。事實上，北京與上海兩個城市，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明顯不同的角色。北京傳統，由於這些因素，在五四運動中，兩個城市都起了重要作用，但各有特點。

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其思想醞釀在上海，人才準備也主要在上海進行。

我們知道，作為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之一，《新青年》雜誌本來是在上海創刊的（1915年創刊，初名《青年》），在上海出版了一年多，1917年才隨陳獨秀遷到北京。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在清末便是活躍在上海的激進的革命黨人。蔡元培是上海革命黨人中有威望的領袖，為南洋公學學潮的支持者、中國教育會會長、愛國學社創始人、光復會會長、辦報、演說、試製炸彈、鼓吹反清革命。陳獨秀於1903年到上海，參與創辦號稱「蘇報第二」的革命報紙《國民日日報》，以後參加過「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蔡元培稔熟。北京大學文科教員中，相當一批人與上海有關係，蔡、陳之外，胡適、章士釗、馬叙倫、黃晦聞、葉瀚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見附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與蔡在上海那段反清活動的經歷很有關係。除了社會地位

2 姚公鶴，《上海閑話》，頁50。

和學問以外，人事關係是重要因素，沈步洲、馬叙倫、范源濂、湯爾和與夏元璥等人在北京的策劃，起了直接的作用。³沈、馬、湯、夏都是蔡在上海南洋公學和中國教育會從事革命和教育革新活動的同志，范與蔡則是參加拒俄運動的同事。⁴蔡在北大羅致的人才，相當一批人在上海工作、生活過，包括陳獨秀、胡適、黃晦聞、劉半農、章士釗、葉瀚、鍾觀光、劉師培、李石曾、劉三、高一涵、朱家驊，⁵其中有些人是蔡元培在上海的同志。

1916年以前，北大以保守、腐朽聞名，不少教授由官僚而來，評論教授的標準不是學問而是官階，學生把大學看作是做官的跳板，教授稱「中堂」或「大人」，學生稱「老爺」，校園道德風氣敗壞，賭博，嫖妓，烏煙瘴氣。蔡元培在1916年擔任校長以後，厲行改革，引進新人，革新課程，訂立新的規章制

3 關於蔡元培出長北大的經過，馬敘倫、張星烺、沈尹默等人的說法不同，但都提到一個人，即范源濂。范當時是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他與蔡元培在1903年是從事拒俄運動的同事，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他是教育次長。參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年），頁47。

4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頁28、46。

5 北京大學教師與上海的關係舉要：

姓 名	摘 要
陳獨秀	1903年至上海，參與《國民日日報》筆政；1913年因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鬥爭，避居上海；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
胡 適	出生在上海，1904-1910年在上海讀書，辦報。
黃 節	1902年到上海，參與編《政藝通報》，1907年在上海籌組國學保存會，辦《國粹學報》。在滬期間，與陳獨秀、劉師培、劉三等很投契，為南社成員。
劉半農	1912年到上海，參與《中華新報》筆政，為中華書局編譯員。
章士釗	1903年自南京退學到上海，入愛國學社，後參與《蘇報》、《國民日日報》筆政。
葉 瀚	1897年來上海辦《蒙學報》，後參與中國教育會工作。
鍾觀光	1902年以後上海參加中國教育會、愛國女學工作。
李辛白	1907年在上海辦《安徽白話報》，同盟會員。
沈步洲	上海愛國學社成員，曾在張園演說。
劉 三	上海人，晚清因收葬革命烈士鄒容屍骨而被稱為義士，南社成員。
高一涵	從《青年》雜誌第一期起，即為撰稿人。
朱家驊	1908年在上海同濟德文醫學校讀書，後參加反清起義。

度，整頓校風。蔡元培這麼做，他在德國接受教育的經歷，對西方國家教育情況的了解，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他在南洋公學、愛國學社從事教育活動的實踐，在上海推動軍國民教育的經歷，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種改革，是將上海的新人、新風氣、新文化引進北京。發生在北大的衝突，其實是京滬兩地文化衝突的體現。

新文化運動中對傳統禮教的批判，對西方文明的禮贊，在清末上海都可以找到其起始點。

陳萬雄的研究指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內容的反傳統思想，在清末已是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思想的組成部分，並與其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一脈相承的關聯」。⁶在清末，這種文化革新思想發表的陣地，在國內主要是上海。比如，對於孔子的批判，1903年《童子世界》便有一篇〈法古〉，批判矛頭直指孔子，認為「孔子在周朝時候雖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來，也是很壞。至聖兩個字，不過是歷代獨夫民賊加給他的徽號。那些民賊為什麼這樣尊敬孔子呢？因為孔子專門叫人尊君服從」。同年《國民日日報》上有〈箴奴隸〉〈說君〉〈道統辨〉等文，批評儒學不遺餘力。1904年《警鐘日報》上有〈論孔學不能無弊〉、〈論孔學與政治無涉〉，批評孔學執己見而非異說，批評獨尊儒學有礙學術自由。《民吁報》《民立報》上，也都有指名批判孔子、孔學的文章。「這種反傳統的文化革新的思想，討論範圍所及，由政治制度，到學術思想、社會倫理、風俗習慣，表現了相當徹底和全面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而態度也激烈」。⁷

清末對孔子的批評，對三綱五常的批判，並不限於上海一地，無政府主義者在東京、巴黎出版的雜誌，也頗多這方面的內容，但是就國內而言，以上海為最。

⁶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頁115。

⁷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頁120。

一

五四運動作為民眾愛國運動，爆發在北京，其運動方式有一部分伏根在上海。集會演說，散發傳單，通電抗議，罷課罷工，抵制洋貨，這些抗議方式在清末民初上海已不止一次被運用。

在1900年至1903年的拒俄運動中，上海紳商多次在張園集會演說，散發傳單，發表通電。比如，1901年3月15日，上海各界二百餘人在張園集會，共商拒俄。會議之前一日，發起人在報紙上刊登傳單，號召在滬各省官紳士商與會。會上，汪康年等登台演說，聲討沙俄侵犯中國主權，呼籲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合力與爭。會後致電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曉以民族大義，勸說他們堅決反對沙俄的侵略；致電中國參加談判的代表楊儒，要他力挽狂瀾，挫敗沙俄陰謀。1903年3月24日、4月27日、4月30日，士農工商各界千餘人三次聚會張園，除了演說、致電，還發起了捐款活動。愛國學社、育才學堂、務本女塾、愛國女學的男女學生尤為踴躍，蔡元培、葉瀚等人還發起成立了愛國團體國民總會。

在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上海紳商集會演說，散發傳單，發表通電，上海紳商約定不當美國人的雇工，不卸載美船貨物，實際上已是罷工行為。清心書院、中西書院的學生已有罷課舉動。比如，1905年5月22日，美國教會辦的清心書院「全學解散」，中西書院學生亦自是日起停課。8月，上海學生特組織一「中國童子抵制美約會」，公定章程，相約嚴守：日夕所用讀書文具概不用美貨，所穿衣裳及食物玩器概不用美貨，每日調查美貨牌號，登諸會內，供眾知曉。9月8日，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特別大會，到會者百餘人，顏惠慶等相繼演說，表示華工禁約不廢，抵制美貨不止。會後，吳趼人等游歷杭州、寧波等地，計劃聯合各地拒約會，結成一個大團體。這種商學結合、學生由學校而社會的運動方式，與五四時期非常相似。

1915年3月因反對「二十一條」，上海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到4月上旬，發展為罷工鬥爭，楊家渡、日清、三菱公司、浦東日商新老大阪公司、洋涇三井

煤棧等碼頭工人都投入了這一鬥爭。

這些抗爭方式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首先出現，與上海社會結構、政治格局有密切關係。一市三治，新式人才薈萃，集會、演說相對自由，傳播媒介發達，都是其中重要因素。

華子建（Jeffrey Wasserstrom）的研究表明，五四運動的許多抗議形式與此前上海社會有關，列隊、奏樂、升旗、演講、遊行、呼口號、罷課、抵制外貨，都與租界的慶典、體育活動有一定關係，與清末上海紳商、學生活動有一定關係，在五四運動中發揮關鍵作用的罷課，17年前（1902年）在南洋公學就已上演過。

五四以前，各校的學生和進步教師為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領土的侵占，還多次舉行集會活動。除了上面提到的拒俄愛國運動和1915年至1918年的反抗日本的鬥爭以外，上海青年還參加了1905年的反美愛國集會。因此，當我們把五四運動看成是中國青年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起點時，應該看到1919年的抗議者是在繼承長期以來所形成的抗議傳統。⁸

從清末民初上海民衆反對帝國主義的抗議形式來看，1919年的五四運動，實際是上海運動的重演、放大和發展。

三

白話文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這一運動在晚清上海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

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與維新啓蒙同步。在維新人士看來，中國之所以貧窮落後、挨欺被打，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民衆沒有覺醒。要喚醒民衆，就要講民衆能夠聽得懂的道理，寫民衆能夠看得懂的文字。於是，文字改革、小說改良、詩歌改良、戲劇改良、畫報、演說、白話文，都被賦予維新啓蒙的意義，

8（美）華子建，〈正確的抗議策略是從哪裏來的——上海學生運動傳統之演變〉，《上海——通往世界之橋》（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頁127。

也隨著啓蒙運動的開展而追波逐浪。白話文運動興起的另一個動力，是近代城市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近代白話文報刊最大的讀者群是城市居民。近代城市人口的增加，特別是像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從農村來的移民的增加。這些人大概有一半人粗識字。他們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種運動爭取的對象。白話文運動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他們的。

上海是晚清白話報紙的發祥地。據研究，晚清最早的白話報紙是1876年3月30日創刊的由申報館出版的《民報》。此報每逢周二、四、六各發行一張，「賣五個小錢一份，它的特點是在用白話寫的，可以幫助讀者容易懂得它的內容，每一句的末尾都空著一格，人名和地名的旁邊，均以豎線號和點線號表明，並且只售半個銅板一份，是使它可以達到《申報》所不能及於的階級，譬如匠人、工人和很小的商店裏的店員等。它將每天刊行」。⁹我們尚未看到此報，不知具體內容、停刊時間和編者情況，但《字林西報》對它有介紹，《申報》在1876年5、6月曾連續刊載廣告，對它進行介紹。

上海也是晚清白話報最為集中的地方。1911年以前，標名「白話」、「俗話」的報刊有41種，如《演義白話報》、《中國白話報》，連同那些無白話報之名而有白話報之實的報刊，一共140餘份。其中至少27份在上海出版，¹⁰在全

9〈六十年前的白話報〉，《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頁321。

10 晚清上海白話報刊舉要：

名稱	館址	創刊時間	備注
民報	申報館	1876.3.30	申報館附設，雙日刊
蒙學報	漢口路望平街	1897.10.26	葉瀚主編
演義白話報	福州路惠福里	1897.11.7	章伯初、章仲和創辦
女學報	西門外文元坊	1898.7.24	康同薇等主筆
通俗報	北海路漢洋書局	1899.7.12	每張售價4文
方言報	福州路泥城濱	1902.4.10	用寧波、廣東等方言
蘇州白話報	望平街文翰齋	1902.8.5	用蘇州方言
智群白話報	不詳	1903.1.	砭俗道人主編
童子世界	愛國學社內	1903.4.6	何梅士等主編
寧波白話報	望平街啓文社	1903.11.	寧波同鄉會主辦

國排名第一。有些本該設在外地的，如《寧波白話報》、《湖州白話報》、《安徽白話報》也設在了上海。

五四時期倡導白話文的健將，有些本來就是晚清辦白話報、寫白話文的活躍分子，如胡適等人所辦的《競業旬報》，1906年10月創刊，1909年6月停刊，共出41期，是晚清上海歷時較長的白話文刊物。胡適便是從這裏開始了他從事白話文運動的歷史，他日後回憶說：「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一個開路的工人」。¹¹

四

五四運動5月份在北京表現為學生運動，6月份在上海則表現為市民運動，工人、商人都被捲了進去。三罷之中，罷課影響固然不小，但罷工、罷市作用更大。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在別的城市首先形成三罷的局面，與上海的社會結構、社會特點有密切關係。自清末地方自治運動以後，上海紳商已在上海社

中國白話報	新馬路昌壽里	1903.12.19	林獬、陳敬弟等主持
湖州白話報	不詳	1904.5.15	錢玄同等主辦
白話日報	不詳	1904.6	
初學白話報	不詳	1904	
新世界小說社會	不詳	1906.7.16.	警僧主編
競業旬報	中國公學內	1906.10.28.	傅君劍等主編
預備立憲官話報	不詳	1906.10	莊景仲等發起
中國女報	北四川路厚德里	1907.1	秋瑾創辦
競立社小說月報	不詳	1907.11.3.	彭俞主編
新中國白話報	不詳	1907	
衛生白話報	衛生白話報社	1908.6.	代表人陳繼武
國民白話日報	不詳	1908.7.28	范鴻仙主編
安徽白話報	馬律師路馬德里	1908.9.	李辛白主持
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社內	1908.10.20	姚下余生編輯
上海白話報	九江路石路	1910.11.2	謝慈禪編輯

¹¹ 胡適，《四十自述》（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影印本），頁135。

會活動中占居領導地位。在經濟中心、交通樞紐、信息中心、移民人口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上海紳商在全國性愛國運動中起了關鍵作用。在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大鬧會審公堂事件中，上海商人都是運動的主體。五四運動作為愛國運動，其取得勝利的重要標誌是曹、陸、章三人被罷免。這是全國運動合力作用的結果，其中上海的作用至為關鍵。北京《晨報》披露三人被免職經過是這樣的：

茲聞此項命令（即曹、陸、章之免職命令）之發表，實分為三次，其第一次發表者免曹令，蓋日前已內定者也。乃該令發表之際，即得天津罷市之消息，同時上海各銀行又電京行報告上海罷市綿延多日，形勢日益重大，政府如不能盡本日將罷免曹、章之命令發表，則滬上金融無法維持，危險萬狀云云。京行得此電報，遂聯合向政府聲明，並請速定辦法。政府無可如何遂於昨（10日）午後將陸宗輿免職令發布，以為如此，似可饜足商學界之人心，而鎮壓眼前之危險。孰意下午復得上海中國各銀行團體及商會，略稱：政府如能將曹、陸、章三人同時罷免，則彼等可擔任向商界竭力疏通，勸其於明日開市，如不能完全辦到，則商民有所藉口，前途將益糾紛，安危所繫，只在一日，專候明示云云。……政府迫於無法，遂答應再將章宗祥免職令發表。¹²

北洋政府對曹、陸、章三人採取的是能保則保、不能保則一個一個拋出的辦法，三個人分三次拋出，每拋一個，都與上海的動向有關。北洋政府之所以特別重視上海的動向，原因誠如時人所說，「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¹³

¹² 《晨報》，1919年6月11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20。

¹³ 6月8日盧永祥等電北京政府請力顧大局、明令准將曹、章、陸免職，《新聞報》，1919年6月10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頁418。

五

同樣是學生運動，上海學生的運動策略似乎也與北京有所不同。上海學生似乎比較注意鬥爭方式。比如：

1919年6月5日上海罷市以後，學生上街維持秩序，發布通告，「切懇同胞勿與日人爲難，一經發生交涉，有關大局，應各守文明，切勿暴動」。¹⁴6月6日，學生聯合會分隊遍歷全城，各持招貼、旗幟，勸華人留居家中，勿群聚馬路上，並發通告令各學生勿與人爭，謂學生被擊，當即走避，此非怯懦，爲救國計，不得不犧牲個人之傲態。學生會向先施、永安兩公司各借得汽車一部，遊行全城，商民切勿騷動，尤力勸下等社會之人勿團聚街中。¹⁵這種鬥爭方式，似乎也是上海學生運動的傳統。在拒俄運動中，上海學生便提出「文明排外」的口號。比如，1901年3月24日，各界近千人聚會張園，集會宗旨，凡四條，其中第三條便寫明，我輩集會，係籌中國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對待外人，各種行爲，「一依文明所爲，主持公理」，而不是像去年義和團那樣。¹⁶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學生、商人團體與官府解決意見分歧，採取的是和平對話而不是尖銳對立、武裝衝突的方式。1919年6月7日，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等地方政府官員，與上海商、學各界代表百餘人開會，討論時局問題，各抒己見，有民間團體對官員的批評質詢，也有官員的辯白解釋。經過辯論，最後以表決的方式，達成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意見。這種溝通，對於盧永祥態度的改變是有作用的。商、學代表要求盧永祥向北京政府轉達罷免曹、章、陸的民意，盧開頭並不接受，認爲這樣做跡近要挾，作爲政府官員「不能代達」。經過對話，他最後還是同意轉達。一些商、學代表開始提出的要求是「先免曹、章、陸，後開市上課」，經過對話，也作了妥協，同意「先開市上課，後發電北

14 《時事新報》，1919年6月7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頁313。

15 《英文滬報》的報導，載《時事新報》，1919年6月7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頁314。

16 《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年3月25日。

京」。¹⁷當時，商、學團體要求罷免、懲辦賣國賊的各地都有，但以地方官員出面轉達此要求的並不多見。

北洋政府在北京，對學生運動一度採取強硬手段，逮捕的學生超過千人。上海地方政府的處理方式則有所不同。盧永祥雖然也執行北洋政府的命令，勸阻學生罷課，不准擅自集會，銷毀愛國傳單，所部軍警也與群眾發生過衝突，但從總體上說，不像北洋政府在北京那樣嚴厲。運動剛開始時，他甚至對民衆運動表示同情：

昨日（5月6日），上海縣沈知事爲國民大會事，曾至龍華護軍使署請示。聞盧護軍使認爲國民應有之事，且聞盧使已電呈府院，陳述滬上民情憤激，將開國民大會，力爭挽救等情。電文中有「國勢雖弱，民心未死，請飭和會專使據理力爭，堅持到底，以順民意」等語。¹⁸

盧永祥是山東人，對因山東問題而起的民衆愛國運動，內心深處的想法可能比較複雜。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處理問題的方式，與上海官府處理涉及洋、官、民三方面矛盾的傳統方式可能有關。上海官府在1897年處理小車工人抗捐鬥爭、1903年拒俄運動、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1915年抵制日貨運動時，官民之間都有對話，都沒有發生很大的暴力衝突。盧永祥在處理民衆運動問題時，也會受到這種傳統的影響。上海城市大部分地區爲租界，並不完全在中國官府控制之下，這是盧永祥以及以前上海地方政府官員不能爲所欲爲的根本原因。說到底，上海官民矛盾的調解採取和平對話而非暴力衝突，是由城市特點決定的。

五四運動是一次全國性的愛國運動和思想文化運動，上海所起的作用只是其中一部分，本文由上海立論，旨在從地域角度進行分析，揭示上海在全國的地位與特點。總的說來，就五四愛國運動而言，上海在運動前，在思想醞釀、

17 《新聞報》，1919年6月8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頁382。

18 《申報》，1919年5月7日。《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頁708。

人才準備方面，起了奠基作用。在運動起來以後，上海罷工罷市，在曹、陸、章倒台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在抗議方式方面，上海起了先行和示範作用。就新文化運動而言，上海在批判封建禮教、宣傳西方文明方面，在倡導白話文方面，都有先導作用。

「祖國」的發現與民族、宗教、傳統文化的再認識 ——中國穆斯林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王柯**

儘管歷史即將邁進新的世紀，新的千年，但是中國人始終沒有解開沉重地壓在心頭上的一道難題：在19-20世紀之交龐大的帝國能夠毀於一旦，中國人從此不得不渡過充滿苦難與屈辱的百年，其根本原因，究竟是在於一個政權的政治腐敗或為政者政策決定上的失敗，還是在於中國的傳統文明自身？近年來學界的視線越來越多地集中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上，實際上也沒有超過上述問題意識的範疇。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使中國人產生並開始普及近代國民意識，因此被認為是中國從傳統社會走向近代社會的分水嶺，對於五四與新文化運動的是非功過，學者們已見仁見智，大加評說，筆者不願班門弄斧，所以避開五四與新文化運動自身，而將目光投向中國的一個穆斯林群體——回民。¹ 在20世紀初的

* 本研究承日本三得利文化財團支助，特表謝意。

** 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部助教授

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認定回民為一個民族——回族。回民作為一個民族是否成立，不僅可以運用民族學的理論進行研究，而且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如何解釋「中國」的國家構造問題，因而可以、也應該從歷史上中國各民族的形成與消亡的法則上進行探討。但因此課題不屬本文探